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九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六〇期（zk1901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春秋史笔】	夏虫语冰录——世纪回眸话文革	陈中平
【各抒己见】	文革成因探析	裴毅然
【追根溯源】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充分因素概述（下）	沈 昆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春秋史笔】

夏虫语冰录——世纪回眸话文革

• 陈中平 •

◇ 小引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认真反思和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久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从反思的立场概括评述，着重于历史的对比与回顾，以冀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在旷远肃穆的历史长河面前，个人是那样渺小。囿于见识与水平，深感“夏虫不可以语冰”（《庄子集释》），这样的尝试也许不成功，但努力还是值得的。

◇ “奉旨造反”与“引蛇出洞”

文革是毛泽东自编自导的一场政治连续剧，从一开始就具有“奉旨造反”的鲜明色彩。首当其冲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囊括了京畿、保卫、宣传、内务等要害部门。文化领域是扫荡的重点，掌管教育的蒋南翔在劫难逃。将预设的“猎物”抛出来充当靶子，有利于鼓动革命小将起来造反。而文革的主要目标刘少奇，则被推到前台，充当“围猎”的领导者。

刘少奇派工作组的目的，是想把运动纳入他能控制的轨道，来掩护自己度过难关。毛泽东毕竟棋高一着，他从幕后现身，“炮打司令部”，通过宏大场面制造声势，培植亲信，荡涤社会，训练民众，以求全面掌控运动的领导权。

造反的主力，是一批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工作组设定的框框很容易被冲破。清华蒯大富抓住王光美爽约一事，写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触动了工作组高度紧张的神经。用反右的方式进行反蒯，是他们最为熟悉的手段。

大会批判和小会围攻双管齐下，我参加了第二教学楼一场近百人批判会。面对着七嘴八舌、指手划脚的指控，蒯大富用肢体语言表明，他似乎很淡定。侧过身仰起头，眯着眼睛把右手往前一摊：“拿材料来！”

“怀疑一切”是当时流行的主要思想武器。蒋南翔欣赏的学生尖子叶志江不甘寂寞，写了一篇语带嘲讽的游戏文字《鬼大夫救鬼秘方》，却被视为《燕山夜话》的翻版。反复推敲的结果，居然有了惊人发现：原来秘方79页暗喻“气死周叶（工作组的两位组长）”，106页就是“叶林溜也”。所谓的大批判，简直到了捕风捉影的荒唐地步。

老蒯那不服输的倔强精神，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最大的作用，是无意中逾越雷池，直接触动了刘少奇营垒的核心，使自己成为“两个司令部”斗争中一枚极有价值的过河卒子。

北京高校的文革先锋人物，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动向与焦点有着密切联系。最近看到聂元梓大字报共同作者的一篇文章稿，详细说明了大字报酝酿出炉的全过程，否认他们的写作得到过康生和曹轶欧的授意指使。

这张大字报的诞生的背景，是北大作为高校社教的试点，聂元梓等人与陆平为首的校党委矛盾逐步激化，就像瓦罐里受到挑逗的蟋蟀，非要决出个胜负死活。聂元梓等人遭受围剿，正好借着“五一六通知”的东风，来一个绝地反击。

大字报的矛头，直指校党委及其后台北京市委。虽然充满火药味，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只有经过曹轶欧与康生穿针引线上达天听，发挥“政治炮弹”的作用，才能身价百倍，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8月开始，毛泽东接连十余次检阅红卫兵，把全国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北京的红卫兵由中学的干部子弟首先发起。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以“破四旧”的名义，在一些部门的配合与怂恿下冲向社会，打砸抢抄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红色恐怖”行动，而且迅速向全国蔓延。

清华大学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把校园里源源不断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统统扑灭。“824行动”扫荡了清华园，撕毁了大礼堂前全部大字报，推倒了二校门，对各级干部和牛鬼蛇神的暴力惩罚也立刻升级。

文革中所有的派别，都成了身陷罗马竞技场的角斗士，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千方百计把祸水外引转移目标。舆论众矢之的和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成为最容易捏的“软柿子”。各派又都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以此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批判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是清华大学所有正在或企图掌权的派别的保留节目。而批判内容则大同小异，无非是招生用人的“阶级路线”以及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两个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学校领导的过错，其实并非什么“资产阶级统治学校”，主要还是受到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崛起和四一四的分化，与全国文革形势紧密关联。精彩纷呈的争斗，成为校内外关注的焦点。两派纷争从形势估计，干部路线的分歧到权力争夺，紧锣密鼓针锋相对。最后图穷匕见大打出手，堂堂最高学府搞起百日武斗，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

经过两年时间，毛泽东对革命小将“教育自己，解放自己”的真实表现，不仅是失望，而且已经完全不耐烦。他要甩包袱了。毛泽东手里可用的“牌张”所剩无几，只好派工宣队进驻夺权。

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何况这些“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他们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淡出政治舞台的命运是必然的。

九年之前，由领袖发起“百家争鸣”演变而成的“反右运动”，与文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1957年春末夏初的“大鸣大放”，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毛泽东历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有很深的成见，他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为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宣称“开门整风”，但是经过解放初期的“五大运动”，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已经“噤若寒蝉”，所以需要反复动员，多加鼓励和怂恿。

“右派”鸣放的重点，就是一本“民主经”。这本“经”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整整念了十年。但是，毛泽东早把“民主经”丢到九霄云外，以前开出的支票，干脆不兑现了。

鸣放言论比较突出的著名“右派”，大多数都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年轻的学生至少也受到过这种气氛的耳濡目染。他们的年龄、社会阅历、知识结构与政治见解，和文革时期“低龄化”的革命小将，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抵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共产党高举民主旗帜，并且在边区率先作出示范。1945年6月，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和毛泽东谈心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打破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解放后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作为共产党的诤友，黄炎培提过不少中肯的建议。在“鸣放”期间的一次整风座谈会上，针对饥荒和救灾问题，黄炎培和解放前曾主政广西的黄绍竑，都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人称“双黄会”。不久黄绍竑被打成大右派，黄炎培得以幸免，文革中黄绍竑被整死。

当年和黄炎培同访延安的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长，也是当时民盟的负责人，因为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被扣上“章罗联盟”的帽子，打成大右派。黄炎培自己虽然躲过一劫，但是这位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在曾经受过他谆谆教诲的后辈之中，竟有七人（包括五名子女）被打成右派！

储安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代的代表。他的事业巅峰是主办《观察》半月刊（1946—1948年）。《观察》坚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云集了一批最著名的作者，包括胡适、吴晗、柳无忌、马寅初、张东荪、傅斯年、梁实秋、冯友兰、季羨林、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他们放言论事，对时局和社会焦点问题作出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公允的评论，吸引了大批知识份子读者。《观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后的一次辉煌，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

1957年储安平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在统战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宗派主义的根源。储的言论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不知所终。

清华大学打了571名右派，北大的右派多达800余名。北大的林昭和人大的林希翎，年轻时都受到民主进步思潮影响，参加革命工作，再入大学深造，民主革命的理念在她们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林昭书卷气重，林希翎活动能力强，两人都“死不悔改”，成了极右派。林昭遭受的刑罚十分惨酷，而她的思考也愈加深刻。林希翎的影响更大，株连的范围更广（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秘书或亲属），仅在北京一地，因此被打成右派的，就多达100余人。

“二林”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林昭惨死刑场，还要向家属追讨五分钱“子弹费”。林希翎生存能力较强，虽然属于不予平反的六名右派之列，却得以移居海外。也许出于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她不大喜欢迎合西方舆论，与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格格不入，最终客死异乡。

反右运动建立起举国舆论一律的体制，奠定了思想文化专政的牢固基础。

◇ 启蒙与增昧

从构建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基本要素来考量与分析，“右派”鸣放的呼吁和诉求，具有更加深刻的内容与合理的内涵。总结57年的“鸣放”与“反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北京高校的文革思潮，围绕政治斗争的漩涡跌宕起伏。聂元梓激情迸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深邃的意义。蒯大富包罗万象的“权经”，只是集权力角斗场“丛林法则”之大成。那些豪情满怀、锋芒毕露、风靡一时的文章，差不多都消退了当年的华彩。而一切企图逾越雷池“触犯天条”的异端，在萌芽阶段就遭到无情扼杀。谭力夫划分阶级壁垒的《血统论》遭到批判，依然有它的市场。而遇罗克针锋相对的《出身论》，则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四三派”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论”似乎掀开了大幕的一角，旋即遭到围剿，销声匿迹。李一哲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呐喊，只有在文革后期怀疑与迷惘情绪弥漫的掩护下，才能在网罗全国的思想牢笼里，获得狭小的“放风”空间。

现在有些文章，把文革视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启蒙期。我认为恰恰相反，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增昧期”，它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文革非但没有导致文明的升华，反而是造成了愚昧和野蛮的退化。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就是为了“拨乱反正”，而这并不是文革本身所产生的预期效果。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真正的启蒙期只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清末民初。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王权衰落，诸侯称雄，民不聊生。思考宇宙人生，探索济世解难，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韬略，成为诸派士子各自的追求。分崩离析诸侯争霸的局面，则为诸子百家提供了宣扬和实施主张的机会。从春秋晚期到秦一统天下，“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大致有300来年。

十九世纪末，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文明面临根本动摇甚至灭绝的危机，激励了士人忧国忧民的担当与勇气。中外思潮互相交融汇合，产生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和

主张，中国的现代启蒙由此发轫。从1895年康、梁“公车上书”算起，直至北伐成功，国民党“清党”和建立全国性政权，新文化运动渐趋结束。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大约有30多年。而其流风余韵，依然在教育界和文苑艺坛萌发播散，更在其后二十年各界士人兴业强国、救亡图存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滚滚大潮中得到发扬。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这个“启蒙期”的重要组成和重大事件。但是，二者还不足以完全涵盖这三十多年的“现代启蒙期”的全部丰富内容。这个“启蒙期”对于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我不同意“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集中力量抵御外敌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为了抵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曾经系统发表了许多宣扬民主的文章，美国在反法西斯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成为中国民主潮流的助推器。蒋介石表面上大权在握，但无法真正做到军令、政令和思想的高度统一。报纸揭露权贵贪渎，参政会抨击政府要员，尽管有特务的威胁和“党化教育”的压制，文化教育界依然有滋生民主的气候与土壤。救亡并没有压倒启蒙，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向前发展。国共之间的“第三方”应运而生，民主潮流逐渐高涨，民主党派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解放后只存在了短短四年。这本来是一条走向现代国家的光明之路，却被完全放弃了。通过解放初期“五大运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彻底的解构，由各种组织加以管控。

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只用了三个月，对思想钳制禁锢的效果，使中国几乎倒退了一个世纪。一切独立、理性、民主、自由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以及它们存在与表达的形式，在中国已经没有立锥之地。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冲击刘少奇司令部，各级组织成了难以逾越的坚固壁垒，采用历次运动的惯常做法，已经很难奏效。鼓动红卫兵无所顾忌地起来“造反”，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创举。可惜，这些激情过度的小将很难驾驭，无法达成他的战略目标。

“天下大乱”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工宣队和军管会取代了红卫兵，成为手执上方宝剑的钦差。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环紧扣一环，不断制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高压态势。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大学，工化系两位有多年党龄久经历次运动考验的副书记，在短短数月内相继自杀，大批教师被下放到鄱阳湖畔的旧劳改农场（囚犯早因血吸虫病高发而迁走）接受“再教育”，不少人罹患痼疾终身难愈，有的因此丧生。

文革是“增昧”的顶峰，它与“启蒙”完全背道而驰。并且造成人格与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曾经红得发紫的郭沫若，在批林批孔时不惜斯文扫地，自鄙自诬，北大的冯友兰等人，也上了“梁效”的贼船。

不少文革初期崭露头角的小将，在斗争漩涡中险遭灭顶之灾。他们在逆境与挫折经受磨难锻炼，扎根底层转换视野。有些人逐渐省悟，挣脱了文革的桎梏，从肤浅浮躁变得深刻成熟。这样的思想境界升华，并不是文革孕育出来的果实，而恰恰是走出文革取得的收获。

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借古讽今”是一种无奈而巧妙的表达方式。但是《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之类文章，都成为文革批判的重点。只有替四人帮鸣锣开道，才能以古喻今，贬斥孔子尊崇吕后，成为梁效之流的拿手好戏。

“政治谣言”，成为政治高压气氛下一种思想表达的特殊形式。位卑未敢忘忧国。“总理遗言”的炮制者李君旭才华横溢，他和好友私下议论时局获得启发，独自完成一篇足以乱真的“高仿”，说出当时千百万人民的意愿和心声。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苏醒期”。配合政治需要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思想界新风吹拂，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出现了中兴景象。但这个“苏醒期”前后历时只有短短三年，它的启蒙作用是有限的。

◇ 魂兮归来

百余年来，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艰难坎坷。一批中年学者撰写的《重思胡适》文集（1），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知识界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论战，胡适是一位主角。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转型必须重新建立国家认同，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立宪民主的政治，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国家认同的正道。胡适认为：“新式独裁”的后果只能是“旧式专制”。

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以其无比的人望，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实行国家转型的大胆尝试。文革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和蓄意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以民主之表行暴力之实（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把执政以来的政制体系砸烂推倒重来（原组织瘫痪，建立立革委会），以回归原始的乌托邦消灭“三大差别”（知青下乡，五七干校），以制造和夸大阶级斗争来维持高压态势。为了这场以失败告终的巨大尝试，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建国之后近三十年，我们已经“破”得太多，而真正应该“立”的，却没有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巨大成就，而思想建设则鲜有亮点。虽然宣传部门竭尽全力鼓吹灌输，却很难建立深入人心的共识。

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时至今日，不同的群体利益冲突与意见对立十分尖锐，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族群的“撕裂”。

以各种形式为文革招魂，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潮流。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社会弱势群体对现实不满，向往毛泽东时代的表面平等。毛泽东反对特权阶级的思想，对于消除干群鸿沟、城乡差别的设想，用“四大”方式来揭露阴暗的方法，对他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但是，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干群平等”，很多只是特定时期的表面现象或行为。历史悠久的特权制度不可能废除，怀念以往表面甚至虚幻的“平等”，企图以暴力来反抗现实社会的不公，实在是一种无奈与悲哀。

权力市场经济环境下疯狂成长的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但是采取打土豪或文革揪走资派的暴力斗争方式，将给社会秩序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与破坏。仅靠运动式的反腐肃贪，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走宪政和法治之路。把权力关进笼子，用法律制裁掠夺，根本改善二次分配。

是否承认“普世价值”，是一个关乎基本常识的“难题”。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部分从字面上和“普世价值”雷同。但是，至今也没有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深入解

读。“自信”的理论家也很难把它们和“普世价值”区别开来或诠释清楚。所以这样的“价值观”，只能作为口号，悬挂在大幅标语牌上。

在有些人热衷于为文革招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呼唤与恢复大学之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大学之道”的真正精髓。如果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遭到湮灭或阉割，大学的校园再美，楼馆再高，设施再好，也没有了魂魄。

近年来对于高等教育的种种框限和禁锢，可以看作教育领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升级版。如果中国的高校，再像文革后期那样，重新陷入僵化的死胡同，变成科技培训班和吟诵教条的庙堂，我们的教育将失去前途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初，清华的战友汲鹏曾经慷慨陈词：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而在现实生活中，历史简直成了可以随意捏塑的橡皮泥。其实掩盖和遗忘就是一段历史，无所作为、浑浑噩噩也是一段历史，它记录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僵化和道德退化的过程。

那些追求理想的殉道者，顾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正在渐渐远去，有志者仍将努力前行。杜牧的警句在耳畔回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我们能不能突破这可悲的循环，全靠一切往生、在生、将生、未生的思想者，一步步踏在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作为文革风暴核心的亲历者，我们现在都已届耄耋之年，恐怕没有多久都要走进历史。当我们在历史中和古人相遇，面对着那些先贤鸿儒、名仕耆宿，以及无数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毁家纾难的同胞，和为国捐躯的国殇英烈，我们能否自豪地说：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奋斗牺牲憧憬的“中国梦”就要实现了，这究竟是不是他们和我们理想中共同的梦？

八十年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蒋南翔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光荏苒，在我们躬奉盛世憧憬梦想之际，我殷切期望：今日之中国，能够容得下一个充分表达各种意见的理性论坛。

2016年3月20日

注释：

（1）《重思胡适》任剑涛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陈中平，男，1940年生于上海。1957年考取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后转工程化学系，1963年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68年分配工作。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香港光大集团公司重点项目部总经理。2000年在苏州热工研究院退休。〕

◇ 讨论帖选登

▲ 陈长坤：陈中平文章写得很好，文革不是什么启蒙运动，而是增昧，是运动群众、愚弄群众的运动，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文革只能从反面教育了国人。由于缺乏对文革的彻底反思，所以迄今一些文革的余毒仍在作祟。

▲ 陶世龙：陈中平先生的文章，概括全面而又深刻，大有助提高对文革的认识。对反右的分析在清华尤有重要意义。所谓十月革命开始的国际共运是人类历史中的逆流，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逐渐破产，文革是利用愚民以维护原教旨作的努力。

▲ 高小康：关于文革反思，我的看法如下，不知是否属于不同声音。

一、我在文革中的表现：

1、文革初期，我是老红卫兵，我曾告诉我的同班同学，“那是我一生的耻辱，确实不愿提起”。

2、“二月逆流”期间，我曾“炮打”过中央文革，以致尽管观点是“老四”，但414也不肯接受我参加。

3、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不曾写过一张大字报；毛去世后，我没戴过一天黑箍，后又找出种种理由，未去参观过纪念堂。

二、我对反思文革的看法与思路变迁：

1、我赞成认真反思文革，群里不少文章和帖子使我的思想得到升华。但感觉这些观点只是使对文革有正确认识的人思路更清晰，但无法说服对文革有错误认识的人。现在的七旬老人（甚至更多），都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谁也说服不了谁，故我认为，我们自己就一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即可。

2、我们可以去外界宣传观点，但最好文章不长，字数不多，尽量平易近人，说“白话”。比观点更重要的是事实，是典型事例。宣传实在太重要了，我有时哼歌，发现翻来覆去只会唱革命歌曲，几十年的教育太深刻了。

3、我对文革，从无意识的反抗到有了（自认为）清楚的认识，是因为看到了大量资料，了解了大量事实。“摆事实，讲道理”，最关键的是“摆事实”，如果舆论阵地像“讲抗日”一样讲“文革”，恐怕不用我们去启发民众，民众早已从了解的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可惜，此想法是不现实的。

▲ 傅孝复：@高小康，与小康兄同感。我在1976年入党，时值“批邓反右倾翻案风”，我在入党志愿书上坚决不批邓，毛纪念堂也从未去过。

▲ 孙怒涛：@高小康，我认为，当年参加老兵也好，参加造反派也好，那都只是一种观点。只要没做如批斗老师，带头抄家，责罚干部这样的亏心事，都算不上耻辱。如果做了，今天有愧疚，有反思，那已是“知耻近乎勇”了。

▲ 郑春湖：陈学长“魂兮归来”一节借胡适语，“国家转型必须重新建立国家认同，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立宪民主的政治，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国家认同的正道”。以及“我们‘破’的太多，真正应该‘立’的，却没有立起来”是全文点睛，可惜未能深入展开，还寄望陈学长就未来之路具体应如何一步一步走，何为国家认同，怎样收拾人心，如何才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等加以阐述。

▲ 陈中平：@郑春湖，关于我们国家民族今后发展的道路，我说不出太多道理。无非是逐步落实宪法（尽管尚不完善）赋予公民的权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是落实言论和出版的自由。马克思当年不就是这样大声疾呼的吗？

我始终认为，只有具备容许百家争鸣的大环境，真正的启蒙运动才会到来。

▲ 蒋南峰：陈文讲到启蒙、百家争鸣、大学要有自由思想，那也就应该允许毛左的思想，允许他们自由鸣放，只是不能允许他们重上井冈山。文革期间的保护少数方针我们都有体验，非如此不能体现真正的自由思想。当年我们都曾是毛左，现在不都转化过来了吗？

陈文中讲到校园自由思想。当年我们两派最后导致武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双方都充分发挥了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党的优秀传统。现在应该吸取教训，允许校园中的不同观点。抛弃上面“抓、扣、打”的三步曲。校园中如能真正实现自由思想，当然中国梦也就实现了。

▲ 王铁藩：作者提纲挈领的架构，言简意赅的语句，使得哪怕是草草过目，都会得窥文革的全貌和领会作者的观点。这对观点的交流和文革的反思大有裨益。读者不枉此机，先就“奉旨造反”与作者作一简单的交流。“奉旨造反”似出自某位造反派头头，而且是在被批判时所言。我听到后的第一感觉是，或言不由衷或自轻自贱。就说蒯大富，他不是“无意中逾越雷池”的。在他上大学之前，就对农村老家的情况心有不满并信访过（批蒯时工作组的说法）。再看，清华最拔尖的造反派，像蒯大富、沈如槐、孙怒涛无一例外都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我曾这样写过：走资派有没有？半饱不饱的农民知道，勉强度日的工人知道，生活清苦斯文扫地的知识分子知道。这里的走资派与毛所提或不尽相同——其实毛本人对走资派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推行“三自一包”的，“官做大了”如何如何的，都是走资派。对百姓而言，只要你是老百姓（工农知识分子）不满意的官儿，就是走资派，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你拉下马。这就是沈昆说的官民矛盾，虽不能说它是文革的主线，但确实存在着。而且在文革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井喷式地爆发出来。故而，奉旨造反的说法是个猜想，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找不到根据。

再往深里想，“奉旨造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或者说走了总结文革“宜粗不宜细”的路子。既然历时十年的，于国于民都是伤筋动骨的文革，其参与者，莫不是被毛牵着线的人俑，还不真应了官家那句话：毛错误发动的，被四人帮、林彪集团利用的。这话当初或能蒙事儿，但是，时至今日，四十年过去了，还这么一言以蔽之，谁信呢？毛霸道但不糊涂。正如阎淮所言，毛由于早年的经历，留下对下层同情的刻痕。毛发动群众既有借力打力——拿下刘少奇，也有缓解官民矛盾的用意——说他邀买人心也罢，说他乌托邦也行。

▲ 王振先：当年在造反浪潮的第一波时，中学生（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代表）的造反与清华的老蒯们的造反不同。前者确有奉旨造反的因素，而后老蒯受“狗头军师”点拨去天安门首掀反刘浪潮，就是货真价实的“奉旨造反”。中平学长此言不谬。

▲ 蒋南峰：我认为奉旨造反很精辟地描述了先期的老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

▲ 陈中平：@铁藩兄：关于“奉旨造反”，是我回顾文革初期的政治态势时，自己作出的估计。彭罗陆杨和蒋南翔等，都是迅速抛出来的猎物（和皇家猎场的围猎情景颇为相像）。这样的估计是否接近实际，也许见仁见智。

某造反派头头挨批，说是“奉旨造反”，我没有印象，也不是借用他的说法，但他的辩解并非全无道理。至于其人如果干了出格的坏事，是不能以此来推卸责任的。

我将文革初期和57鸣放比较，是想说明两拨人的不同阅历背景和时代环境。铁藩兄对此应该更有体会。

经过十多年的锻造，各级组织足够坚强，不鼓动小将起来造反，堡垒是根本不可能冲破的。

出身基层的学生，可能对官民矛盾有更多的体会和批判精神。我同意你对蒯大富等人造反精神的肯定。换作你我，恐怕都没有这样的激情和气魄。

蒯大富当时并不知道有两个司令部，但是他觉得工作组的行为出尔反尔，所以他要起来质问。这样他就越过了雷池，成为两个司令部对垒的过河卒。

读了铁藩兄的帖子，似乎认为“奉旨造反”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矮化”或贬低了造反者的情怀和动机。

我觉得其中可能有“简化”的情形，但并没有贬低的含义。至于“奉旨”的内容，并非只局限于抛出来作为靶子的“老虎”。更广义的“旨”，就是毛氏的“四大自由”（它至今仍是毛左的重要思想武器）。

铁藩兄以细节说明造反派各自的处境和追求，他们是毛的同路人，而并非愚昧的追随者。但是，在文革这条漫漫长夜迷航触礁的巨轮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独自脱身，与是否同路人甚至齐心协力无关。

▲ 罗保林：想问一下，66年六月中造工作组的反奉谁的旨？肯定不会奉刘的旨，那么有谁奉了毛的旨吗？真想知道内情！哪位奉了毛旨造王光美工作组反的，现在能透露一下吗？

▲ 吴学民：@罗保林，造工作组的反肯定不是奉旨。但那时谈不上是造反，只不过是提了一些意见，就不为所容，一定要被镇压下去。如果不是毛的需要，蒯大富们就要永远压在阴山之下。此后才有造反派的崛起，形成运动。

▲ 罗保林：造反，不论其对象是谁，其精髓是敢于“揭竿而起”。至于不同的造反有不同的缘起，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支持，则是第二位的！

▲ 冯钧：奉旨应该是广义的理解，得到毛的支持或允许实际都是奉旨，否则早就给打成反革命了！

▲ 王克斌：与其说奉旨，不如说受到纵容和煽动。没有主席的鼓动和支持，没有炮打司令部十六条，没有中央文革的鼓励，造反派都会被监狱收容，成不了气候。

说是造反，实际是主席需要一群打手。我们被骗了。

▲ 李子壮：谈不上“奉旨”，而是被两报一刊“绑架”。那时称作“政治敏感性”，从报缝里找动向，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动态组。包打听。搞情报——这不是奉旨，而是猜谜。

▲ 沈昆：“奉旨造反”之说，低估了造反群众的独立思考与自主行为，而高估了毛的“战略部署”。

老红卫兵的成立与挑战学校领导，显然不是奉旨，而是出于他们执着于阶级路线的惯性。而1966年八月初挑起红色暴力恐怖的少数始作俑者（如刘平平、邓榕等）肯定不是奉了毛旨，也不太可能是奉了其父之旨，很可能是受到或未受某种情绪性暗示的青年人的反弹。

造反学生挑战工作组，批判王光美，殃及刘少奇，也都没有奉旨。后来被“招安”则是另外一轮事物了。

上海工人一月夺权，也并非奉旨，根本不在毛的预料之中。恰相反，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回上海解决上海工人阻断津浦线的问题，原定是劝说工人回厂上班。后来张春桥在与工人谈判时，面对工人的坚持而不得不退让，才有了随后的一月夺权。

两派斗争时期，违旨、抗旨，尊上旨而为我所用，可以说屡见不鲜。

对于造反群众而言，造反（挑战就是造反，不能把造反仅仅理解为夺权。）在前，奉旨在后。与其说奉旨，不如说“招安”。

▲ 启正：我们为什么对老蒯和他的老战友们（群里有很多）有好感，是因为当时工作组按传统毛刘路线要在师生中大搞“阶级斗争”，我们将在劫难逃之时，老蒯们的造工作组反因正合了毛倒刘之计之预设，而竟然完全得成，我们从威胁、恐惧中得解脱、解放，这种感觉岂能忘记？老蒯们也做了一回过家家的英勇的陈胜吴广，恐怕以后较详细的历史中会有记

录。后来老蒯们分裂，成为团、四，那是后话。正是：覆秦岂能忘陈吴？项羽刘邦皆英雄。过家家之总而言之。

▲ 梁颂辉：如果把造反定义为打破现有统治格局的行为的话，文革中的造反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最高”掌控下的一些出格行为。时间只有两年零两个月（之后的称反潮流不称造反）。从广义上来说，都是“奉旨造反”。老红卫兵的“破四旧”，也是“奉旨”（副帅传达的）；反工作组是为了“打黑帮”，还是奉旨；上海安亭事件是反陈曹，依然是奉旨。一旦圣上目的达到，兔死狗烹。

如有不合上意的造反，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格杀勿论。

▲ 刘尚培：从广义说我们一直按照党的教导和指示行事，都是“奉旨”，努力按“旨意”行为。只是文革突然让我们找不到基层组织，必须自己从报纸广播，从毛主席片言只语去猜度“旨意”。

▲ 王嵩梅：时代的脚步已经迈入了20世纪，“奉旨造反”的“旨”已经不是古代皇帝在朝廷之上，由太监向下宣读的“圣旨”了。而是无孔不入的广播报纸、由上向下一级级传达的中央文件，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一次次的挥手、金水桥上的席地而坐，是毛身边的人及其联络员一次次的讲话和接见，……是人们脑中那个战无不胜、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思想。例如清华文革中老团、老四，不论哪派都觉得自己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 杨继绳：我的书中写的是“跪着造反”，跪在毛面前造反。此说是否符合实际？

▲ 吕述祖：@杨继绳，基本同意。严格意义上讲，算不得“造反”。而是在彻底被洗脑以后，甘于做炮灰，为了领袖，甘于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这种“造反”，从根本讲，实际是一种“忠君”，有很深的封建色彩。

▲ 陆元吉：奉旨造反、跪着造反都是形象的说法，但大体上不错。想起一件小事：66年12·24下午我们班贴了一份声明，反对第二天行动，认为是扰乱毛的战略部署。当晚解放军报记者上门，说要主动领会中央精神，言外之意，听者自明。于是连夜再发声明，表态坚决拥护，积极参加。广播台立即广播。我们班文革中籍籍无名，受军报记者关注、暗示，发声明即被广播，仅此一例。蒯初期反工作组并未奉旨，但从宣布恢复绝食坚持斗争的那天起便已成了奉旨者。

▲ 林海：我觉得“跪着造反”只说明了一种状态，“奉旨造反”也有点简单化了，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概括了造反的原因。我觉得原因有三个。一是长年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包括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形成的认知。二是政治形势的逼迫。包括高层政治人物的手腕和设局，散布消息和引诱，嫡系冲锋队的恐怖行动，风云变幻的政治潮流的裹挟。三是个人的价值观实现和利益驱动。包括官民矛盾的愤慨，受压后的反弹，个人实现的野心，甚至同乡好友的面子和感情补偿……等等。

▲ 孙毓星：大家说的奉旨，按旨，跪着造反，在本群的语境下含义可能差不多，但在更广泛的场合多用“奉旨”二字，含有对造反派的缺乏理解和贬损之意。我觉得“按旨”，揣摩圣意去造反更符合当时的情景。如同某位洋人形容文革造反是“抢椅子”的运动，大家争着揣摩“中央精神”去争头功，至少也不能落后挨批。毛的善于权变和随心所欲更助长了下边的投机心理。例如1968年3·24揪出扬余傅后，老团总部在张云辉家开会，猜测谁是黑后台，要往上揪哪位老师，想来真是可笑又可悲。

▲ 马志力：林希翎，谭天荣是真独立思考，真造反。另两位聂元梓、蒯大富，听起来毛腔毛调，已被毛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洗了脑，属广义的奉旨造反。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各抒己见】

### 文革成因探析

• 裴毅然 •

文革乃国际共运顶级怪胎，也是中国为马列邪教支付的标志性学费，今天的会议则是稍稍收回一点“利息”。非常遗憾：只能在哥大918室“收回利息”，而非在最需要收回的中国大陆。当然，这也是今天研讨会的价值所在——能收回一点总比一点不收要强。

欧美都已走到深化自由、落实平等的高层次台阶，中国还未迈上政治现代化第一台阶，尚未争取到“摆脱恐怖的自由”。文革虽被中共否定，但毕竟是中共脸上的疤，至今仍不让摊晾研究，寰内士林必须按中宣部划定的绳圈进行有限研究。邓小平从政治上否定文革，理论上却不让动一铲一锹。毛发动文革的“价值依据”——阶级斗争、公有经济、世界革命等，仍为中共宗奉，因此薄熙来得以重庆唱红、习近平重拾《共产党宣言》。

邓、江、胡都明白中共政权出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保住红色意识形态才能保住“万水千山”夺取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才能“维稳”。

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无论个人感情，还是社会责任、历史意识，当然无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从文革处拿回一点“利息”，至少留下一点自己的思考，不能停留于“决不能再发生”的控诉式呼号，得挖挖文革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不仅为中国，也为人类防堵此类披着理想外衣的赤色邪说，提供总结性经验，形成可操作的防堵程序（如美国移民咨询“是不是共产党员？”）。

文革成因，可从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维度切入。囿于发言时间，只能稍述这方面研究概要、毛泽东倒刘的政治原因，重点落在五四左翼士林何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

总结历史经验，得追索如何形成当时的社会态势，极端歪谬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被中国奉为“圣学”？会得到如此大面积渗透？全球赤难，为何中国最烈？我们的传统文化哪儿存在致命漏洞，怎么会被这则赤色艳说轻易突破堤坝？

## 一、“十因”说

1993年，中央党校马研所副所长金春明（1932～）归纳文革“十因”——

- 1、阶级斗争必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内主导观点）
- 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流行港台、海外）
- 3、封建复辟说（苏绍智阐述最力）
- 4、毛的帝王思想（海内外民间观点）

- 5、乌托邦碰壁说（《河殇》观点）
- 6、群众反官僚说（海内外民间观点）
- 7、东西文化冲突说（少数青年学者观点）
- 8、人性兽化说（体现文艺作品）
- 9、奸臣祸国说（民间旧说）
- 10、左倾恶性发展说（中共党史界观点）（1）

上述十说都进了一个窠臼——单因说。偌大文革，成因众多，任何单因、任何单一侧面都无法解释文革的多维性、复杂性。

## 二、政治歧见——直接政因

毛泽东之所以押上全部政治资本，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只手掀动政治大动作的文革，最直接的原因只能是现实政治原因，否则毛不可能有此积极性，毕竟从上到下打掉刘少奇的“脚”，得罪这么多跟他打天下的忠实部属。

1949年后，政治局常委刘周朱陈，能稍稍提点不同意见的，只有刘一人。一开国，如何对待新富农、工商户、转型公有制的速率上，毛刘一直存分歧，每次毛都以权威压服刘少奇。1958年大跃进造成大饥荒（饿死至少四千万），毛“战无不胜”的神话破裂，权威受到质疑，尤其打倒彭德怀，腾议四起，毛明显感到身后有被做〈秘密报告〉的威胁。“七千人大会”毛刘分歧公开，此时刘在政治局、中委占压倒性优势，中高层都认为毛搞经济不行，毛决定倒刘。这方面史证甚多：

1、1964·12·15～1965·1·14全国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四清”，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将运动重点定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不能忍受任何最轻微的挑战，当众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

2、1970·12·18斯诺采访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喽。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3）

但政治意图越显，目的越丑陋，毛就越要盖衣遮丑。1968·4·10《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毛泽东为文革定性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4）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继续革命”、“马列第三块里程碑”包装文革，迷惑党内外。依托当时的毛崇拜，这套包装还真成功忽悠了绝大多数“革命人民”，包括不少老外，如张爱玲丈夫赖雅。马共柬共、法国“五月风暴”、秘鲁“光辉道路”……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派生物。

从政治角度，毛泽东成功利用了当时的国内形势，达到打倒政敌、阻止“资本主义复辟”、推动“世界革命”等一系列目的。

毛泽东自立文革为“国际共运第三块里程碑”，暴露此人文化层次太低，对文化的基本作用都不知道。对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来说，传统文化都是祖先留下的最富贵的智能仓库、经验总资源。对待传统文化，永远继承第一，剔除第二。漠视文化，革文化的命，对传统文化“一脚踢”，智力极低之蠢事。但文革坑苦了我们这代人，弄得我们自幼失学（上山下乡）。习近平的“宽衣”（宽农）、北大校长林建华的“鸿浩”（鸿鹄），都在有力诉说“文革后果”。

“社会意识”凝固成结结实实的“社会存在”，毛共拧歪几代国人的三观。如今七旬“40后”一代，一生被中共剥夺得干干净净，居然不少人死心塌地拥护中共政权与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的头脑中只有马列毛，只能用赤色邪说进行思维，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各项判断的价值依据。我一位很熟悉的亲戚，去年生癌开刀，今年初上书住建部长并转七常委（要求答复），要求立即停止“住房私有化”、反对宪法加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据是“有违共产主义原则”。他在杭州有一套住房（市值230万人民币），认为自己因房改而“暴富”，无颜面对大批为无产阶级奋斗的先烈先辈。

大陆几代国人的思维装配混乱、逻辑悖谬、价值错乱，连基本人权、自由价值、民主意义等现代核心理念都一团星云。他们居然仍相信共产主义将带人类进入天堂，不明白共产主义打破社会天然平衡，共产共有不是推动生产力而是丧失第一生产力——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一代人需要整体启蒙。不过，这可能是王沪宁之所以建议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的“社会基础”。几代被马列邪说弄歪价值标准的大批“30后”、“40后”，居然为中国恢复私有制捶胸顿足。

因信息封闭，大陆至今90%以上国人并不知道镇反、肃反、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赤难真相，包括南昌暴动、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等等具体历史细节。因此，大批大陆国人不清楚中共对传统的破坏、对文化的毁灭。这也是中共不惜斥巨资打造“金盾”的底牌。因此，海外异士仅仅一句对文革“千万不要忘记”，就已经使中共抖三抖，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回不去的“思想问题”。

### 三、两大对应

吾中华传统文化确有贫弱致因，儒学过于粗疏，未能及时检验并拦滤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产地的西欧，之所以躲过此劫，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文化力量。我们用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欧美则是用经验（历史理性）拦滤住这则邪说。

儒家文化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钻了空子，当然是儒学本身存在缺陷，被赤说找到致命的“对应点”。马克思主义废私立公，根柢在于灭欲，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恰成对应。儒学以等级制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崇尚“克己复礼”，对个权意识缺乏认识，而个权意识乃现代人文价值核心。此外，“均贫富”等大同理念，也与共产主义相呼应。而失去个人财产，人权即丧失最主要的内容。一个没有财产的人，生存都成问题，还如何去争取其他权益？

从文化接受学角度，完全异质的文化很难得到接受国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被“一声炮声”迅速输入、大面积传播渗透，实为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大对应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牺牲个人”看起来很高尚，实质一并送出现代文明核心内涵——个人权益。国际共运单极强调牺牲、要求奉献、只说义务，不提权益、无视本然人性，集体利益岂非被抽空价值

来源？无私之公，“公”为何集？根据歪谬起点搭建的社会主义，除了全民懈怠、逆淘汰，只能催生一茬茬“假公济私”的贪官。

从文化源头上，中华古典哲学过于粗疏，儒学大而无当，无法对接日益精细的现代化，因此被马克思主义钻了空子。欧美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城市”，领先领跑，根子在于古希腊文明有承认个体价值的文明因子。

五四时期其他炫耀一时的各式主义（即得到一定社会呼应），均可从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中找到“对应”。如国家主义对应儒家、无政府主义对应道家、无产阶级造反对应农民暴动。为什么我们请不进“德先生”、“赛先生”，为什么“个性解放”只在五四文学中灵光一闪就熄灭了（包括被提倡者创造社抛弃），根子还是在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缺乏这方面的根须，从古训中找不到可以坚持个性、明确保卫个权的“理论根据”。

对这一点，我来美国感受较深，意识到这正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人文根须。美国已将这一价值认识渗透到中小学教育、制度设置、移民政策等各个方面。

从现实意义层面，中宣部的“七不讲”，包括今年4月习近平的领诵《共产党宣言》，人家还是很有感觉的，敏感抓住“维稳”要害，堵住意识形态最大也是最危险的缺口——个人权益，因此有“普世价值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

#### 四、必须明确个权

病因既显，药方自随——要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也为国家）争取个人权益，保卫不可褫夺的个人财产，牢牢确立个人权益的合法性，即“公民权利必须讲”、“普世价值必须讲”，而且要讲出这是至今未能请回“德先生”、“赛先生”的原因之一。

思想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中共今天的集权，来自国人似乎很高尚的“让权”。否则，农民的土地、居民的房子，为什么会被强拆强征？包括我们的思想、个人的言论，为什么竟被“规定”、“不准”？如果没有毛邓时代的铺垫，能走到今天吗？说到底，中共政府的大把外援、各级贪官的亿万贿款，还不是都是从一个“公民”身上掳走刮走的集体财产？难道我们还不需要向他们要回来？至少，我们有权要求制止这种不经授权的“外援”、有权要求制止“野火烧不尽”的遍地贪腐。

除了必须明确“个权”、“私有制”，政治制度方面，从文革成因中当然还有最明显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没有这两项条件，毛泽东也不可能只手发动文革。

从文化堤坝角度，人性、个权、传统、自由、民主等基础理念，均为不能突破的拦坝。任何企图对这些基础理念动手动脚的，一定是披着理想外衣的新一轮邪说。

我们这些流亡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做点思想舆论的准备工作，利用各种媒体，揭露历史真相、分析赤难原因、拎示经验教训；既启蒙民众，亦为民主转型做点准备。

#### 五、必须清算共产主义

魔鬼总是披着上帝的外衣出行，邪说也总是罩着灿烂外袍。必须警惕那种听起来似乎不错的“理想”，至少历史现阶段（200年内）尚不可能大同。且不说收益联着积极性，大

千世界怎么可能人人相同？有必要相同吗？更何况共产主义形成逆淘汰，造成另一种更要命的剥削：弱者对强者剥削、懒者对勤者构成“优势”。

1959年，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说了一段惹祸的话——“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

〔5〕

理想并不等于真理。造成中国巨大赤难，除了毛泽东这个魔头，最大的祸源在于共产主义这张图纸，大乱甲乙、砸碎炉灶，又糊不起新炉灶，全社会进退失据、深陷混乱。同时，经济上越糟糕，政治上越压制越恐怖。毛时代乃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时期，国人只有“享受匮乏的自由”、“享有恐怖的自由”。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四个主词：私有、市场、平等、福利。“私有”鼓励社会成员尽可能创造财富；“市场”调节需要、保证生产；“平等”适当调节贫富；“福利”让弱者沾享社会进步的均利。〔6〕“私有”、“市场”是基础，“平等”、“福利”的前提，没有物质基础，如何实现“平等”、“福利”？任何理想都得受制于现实可能。“一步到位”、“最后的斗争”……都只能是炫张艳说以售其奸。很简单，怎么可能“一步到位”、怎么可能“最后的斗争”？都“最后”了，以后怎么办？难道人类就此走到尽头了？

注释：

- 1，〈访金春明〉，载《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6—376页。
- 2，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郭家宽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第74—77页。
- 3，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12—18），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196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1966—1968），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 5，杨献珍：〈1959年纪事〉（1959—6—12），长沙，《求索》，1984年第5期。收入关山编：《杨献珍研究数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 6，曹思源：〈瑞典经验——宪政保护了民主社会主义〉，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第80页。

〔作者简介：大兴安岭知青、复旦文学博士、上海财大教授、普林斯顿高研院历史所访问学者。〕

□ 原载《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2018年9月  
~~~~~

【追根溯源】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充分因素概述（下）

• 沈 昆 •

（上接zk1901b）

三，社会因素

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陈词滥调，共产党执政后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其实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在中国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共产党执政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自人类社会产生国家而出现政府或类似的社会管理机构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存在官民矛盾。

在人类社会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政府、法制系统与军队等国家机器从属于强势的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机器的对内功能主要是镇压功能，因此官民矛盾不过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机器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功能日益增加，以避免因阶级对抗而导致社会崩溃，国家机构组织在社会阶级矛盾中逐步趋向中立。与此同时，官民矛盾也就越来越摆脱从属于阶级矛盾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

官民矛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管理机构必然要遵行管理运作的规律，力求实现其最优化的目标，因而自然有其区别于人民大众利益诉求的自身追求。因而，就必然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也就是官民矛盾。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摆脱丛林状态，步入现代文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百多年时间内，通过宪政和民主，实现了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的政府。也通过政府运作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运作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官民矛盾。

中国则不同。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特别根深蒂固。在这种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机构和统治阶级特别强大，也就特别迷信其权力和镇压的能力而拒绝妥协。以至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阶段，官与民的矛盾也就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中共建政后，原本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没有人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的官民关系应该是最和谐的，官民矛盾最缓和。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机构组织仍然会产生官僚主义，官民矛盾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机构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并决定社会资源的调配，官民矛盾还直接表现成经济利益的矛盾，官员与民争利的情况几乎不可避免，而不像私有制社会的权力机构一般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可以在社会的各种经济矛盾中保持某种中立；加之共产党自称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民众的期望也就更高。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官员的损害也就更加失望、更多怨愤。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导致民众与政府严重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公有制不公平，打击和压制了社会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先进人群。其次，计划经济强烈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而往往侵犯民众的利益，甚至造成灾难和生命损失的惨剧。比如，以1958年由薄一波提出而被毛认可并经中央通过的“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针主导的大炼钢铁、大跃进，最终导致了1959—1961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成千万人丧失生命的大饥荒惨剧，成为中共建政后官民矛盾最严重、最血腥的灾难性表现。

2) 公有制经济本身就增长乏力,加之领导经济活动的官员责、权、利严重不匹配,以致领导错误不断,经济建设损失巨大。而国家与政府向来都在经济收益中拿大头,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甚至出现十几年职工不长工资、农民不得温饱的现象。

3) 政府掌控经济和资源的体制下,政治成为最高原则,官员行为必然在维护当局的政治利益的前提下,不择手段追求政绩最大化,而不惜损害民众利益。例如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吹嘘风,文革期间的煽动“三忠于”活动等,耗费大量国家资源制造错误甚至灾难。

4) 权力缺乏制约,官员必然享受特权,腐败不可避免。文革前十几年民众生活的困顿与各地高官们的厅堂楼馆建设形成鲜明对照。

5) 中共建政之初,为巩固新政权,用专政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反对新政权的旧势力,得到了甜头,也因此倾向于以专政的方法对待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把专政的方法延伸到处理任何官员的“眼中钉”,因而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6) 中共向来实行阶级路线,1964年以后又以“不忘阶级斗争”为名进一步拧紧阶级路线的紧箍咒,增强了阶级歧视。

7) 中共对民众的管理,向来使用把民众分等划类的办法,以便确定“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所谓分清敌我友。1963年“四清”运动之后,更在民众中分成从依靠力量到敌对分子的四类人等,更加重了政治歧视。

很有一些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文革前罕见官民冲突的情况,认为文革前的官民矛盾微乎其微,不成为问题。其实不然,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剥夺了个体争取幸福和致富的自由,这就铸就了代表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员与民众的矛盾根基,于是就有了上述七点官民矛盾的严重表现。事实上,当官民矛盾时常表现为民众的公开抗争时,反而表明矛盾双方强弱差距不甚悬殊,一般都可以通过妥协解决。而当官方的压迫势力过于强大,民众的抗争通常只会以失败告终而遭致更严厉的惩罚时,民众通常会选择隐忍不发,官方则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在这种表面平静的隐忍背后则酝酿着狂烈的爆发。这正是中国文革前的情况。

总的来说,官民矛盾就是官员脱离了人民群众。尽管毛泽东固执阶级斗争的思想,把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员错误地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时,确实抓住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

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历经多次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也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却都未能解决,因此最终必然要诉诸于改造中华文化的文化革命予以解决。如此,官民矛盾就构成了导致在发生文革的必然性方面的必要的社会因素。

四, 经济因素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成了变相的“类农奴”。同时,中共当局在1956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基本上全面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状况。加上当时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活动从此一概在权力部门的掌控之下,完全确立了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这样的经济体制虽然具有集中调配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比如中国在1950年代初经济恢复之后，仅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1957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这种经济体制不仅缺乏活力并且效率低下，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就再难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而且这种经济体制往往是生活产品匮乏的经济，甚至发生产品匮乏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成员的无产状态以及失去了自身经济活动的主动权，人们缺乏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警觉而更关注政治利益带来的好处，导致社会政治化与经久不衰的政治斗争。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倾向于支撑专制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公有制所需要的民主政治体制。

在经济实践上，中国在1957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为满足百年积弱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人为地计划了经济大跃进。结果发生了计划经济的最坏危机，大跃进演变为造成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其后，经过几年调整，经济恢复增长，再次面临是因循苏俄的老路，还是另创中国自己的高速发展之路，以及路在何方的问题。

以上各点表明，权力垄断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满足积弱百年的中国高速发展经济的需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权力主导经济的不尽人意反过来成为对权力正当性的挑战，其总和构成了导致文革必然性在经济方面的必要因素。

五，文化因素

中国与西欧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二者的社会发展过程大不相同。

环绕地中海的西欧各国各民族由于相互交流的需要，重视发展与完善有助于交流的机制与工具，以便社会成员无需特别的技巧就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例如作为语言工具的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作为发展致力于思维的工具的哲学与逻辑学，作为帮助科学研究的学科分类，帮助解决数学问题的代数与几何分科等。久而久之，西欧文化中演进成一种重视工具与崇尚工具理性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物的文化。

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华民族由于治水的经验与需要，延续了史前时代重视个人能力、尊崇部落领袖的传统。社会精英期望经个人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社会大众则企盼出现达到能够天人合一之境界的“圣明君主”或“天子”，甘愿俯首听命。从而在中华文化中演进成尊崇能人、重视人的技能而轻忽工具的文化特征，在艺术上就表现为重人的文化。

富有多样性而交流开放的西欧文化否认人可以修行得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如神境界，因此最终创造出追求“真神”的宗教。西欧在整体上始终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度，却有很长一段政教合一的历史，其文化原因大凡可以归结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因子，西欧的社会管理与政治运作也必然像其他事物一样求助于具有“物”性的各色工具（用现代语言来说，软硬件都有）。加之促进智力发展与思想交流创新的各种软硬件工具的助力，西欧社会在公元前5—4世纪就提出了以理性治理社会与依法治国以及公民社会的思想，并随之发展了共和、民主及晚些时候的人权等思想概念。因此，西欧文化是导致共和民主的文化，是有利于发展成现代社会的文化。

而富有历史传统、重视传承的封闭型中华文化（鉴于治水的历史经验）相信人必须遵行天道，因此崇拜“知天道”而“替天行道”的圣人、能人。另一方面则认为属于物的工具（包括程序、法规等软性工具）为人所造、为人所使，是从属于人的，人创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的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崇拜能人轻忽工具的文化因子，中华社会存在呼唤专制领袖而轻忽社会管理工具理性的倾向。这样的中华文化特点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专制基因。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之后，中央集权制表现了有效管理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优越性。因此，虽然秦王朝由于暴政仅历时十四年即遭灭亡，秦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却延续至今。同时，与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相呼应，在思想上实行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以坑儒实现“不争论”，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争鸣大体上是争论而鲜有西欧思想交流的成分，独尊儒术仍然使中国思想界失去了最后一点“脱儒入新”的可能性。此后两千年，中国思想界除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儒术外，没有创生任何可以迎接工业化新时代的新思想，直至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

西欧虽然较早提出了理性治国的概念，但毕竟在人类智识发展的早期，理性竞争不过宗教，以至西欧经历了相当长久的黑暗、蒙昧的政教合一时期。直到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革命，欧洲才进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化追求天道、崇拜圣人与能人，从而在政治上排除了宗教的介入，中华主流社会没有发生过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中国早期社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治理的概念，但是中国很早就实现了以社会精英的理性认识托天理之名治理社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比欧洲社会略胜一筹。中华文化的上述特点却导致领袖崇拜和个人迷信，也造成追求真理的执着，而中华文化的真理含义却是大不同于西欧文化的真理含义的。西方文化中的真理概念，其实是“真实”，或者是“许多人共同认可的某种想法、主意或观念”，绝无接近“天理”或“普遍规律”之类的意义。而中华文化中的“真理”并非“真实”，而是天理的替代物，是“普遍规律”。因此，中华文化对真理的追求，包含着绝对信服的意义，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味。

中华文化崇拜领袖以至个人迷信，以及执着信服“真理”的特点，则容易导致另一类蒙昧：崇拜、迷信能人的蒙昧，以及执着于“天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的基本教义蒙昧。这种蒙昧主义由于可以根据经验和某种理性不断改变迷信的对象，因而反倒是更难彻底消除的。中国的这种蒙昧主义，虽然历经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的第一次启蒙，和五十年前由文革引发但至今未能完成的第二次启蒙，迄今为止仍未被完全破除。

正是中华文化的能人崇拜以至于个人迷信，以及对貌似“真理”之理论的执着追求与实践，构成了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的文化方面的必要因素。

六，文革发生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

上个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全面胜利告终，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随后中国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斗争，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而老牌帝国如英法等受到二战的削弱，面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不得不接受美国关于终止殖民主义政策的劝告，逐步退出殖民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绝大部分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成立了民族国家，其中很多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以及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天然盟友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其鼎盛状态。然而，物质匮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开始显露败象，三大问题困扰着社会主义：

- （1）人民生活用品匮乏，生活水平改善缓慢。
- （2）人民缺乏言论、出版、结社等诸多自由，人权常无保障。
- （3）官僚特权阶层开始形成。

赫鲁晓夫从右的方面在苏联进行了改革，在农业上扩大垦荒和种植面积，推行小组承包制；在工业上推行“物质利益原则”，增加投入；在政治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对干部制度以及社会团体、群众监督等方面做了一些小打小闹的改变。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使工农业生产有所改进，但没有根本改变商品匮乏的局面，却引起了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弹，在1964年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勃烈日涅夫主政后，苏联的官僚权贵阶级的羽毛更形丰满。

自从1950年代末就与苏共发生分歧的中共领导人，鉴于赫鲁晓夫的失败以及勃烈日涅夫主政后苏联的现状，确认苏联通过修正主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更坚定了中共原本就已选择的强化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方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随即公诸于世。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经受了非殖民主义化的冲击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中重新找到了自我。经济上开始引入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国有成分，政治上开始出现左派政党当选执政，社会主义伦理观念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公认的伦理观念。西欧各国在二战后实行的福利政策，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对抗与竞争下，获得了更强有力的动力，日趋完善成熟，最终成为福利国家。此时是西欧列强实现从丛林状态转化为理性状态的过渡时期。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民主这些人类长期追求的价值观，应该适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西方世界虽然早已在思想意识上否定了形形色色的歧视行为，但是各色歧视行为在社会实践中仍然不肯轻易退出。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签署了人权法案，成为美国人权史上一件标志性大事。然而其后仍需经过数十年黑人及其它少数族裔与妇女及其它被歧视群体的斗争与努力，才出现了一个大体上摆脱了各种歧视的美国。

总而言之，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导致抗争与革命的年代。然而，革命的效果差强人意，在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旧有的阶级压迫与歧视被翻了个儿而仍然存在，又增添了更多的政治思想歧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社会主义伦理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旧有的阶级压迫或歧视经过逐步缓解而基本消失，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文化歧视以及其他各种违背人权的歧视则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因此，随之而来的七十年代则是转折的年代，是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转向稳定、发展与合作的过渡年代，是从抗争与革命转变为对话与妥协的过渡年代。是普世价值成为共识并逐步在实践中落实的年代，是人权逐步高涨的年代。

文革所处的时代也更凸显了以政治压制和歧视、以及经济贫穷和和严苛的限制为特点的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官民矛盾。文革所处时代，是人权开始高涨的时代，是西方世界开始消除各种歧视的时代，也是经济发展加速的时代，正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反。但由于在中共治下，中国社会已经政治化，加上公有制下民众没有资产而经济利益模糊不清，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权益上。

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发生的。

然而，由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中国社会在伴随世界时代潮流发生社会变动时，必然呈现巨大的社会惯性，仍然会顽固地力图维持阶级抗争与革命的方向，中国的社会转变需要转过一个大圈。

文革作为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变时期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那些行将没落和被涤荡的、违背世界发展进步的旧事物，以及那些顺应世界发展进步、代表了先进与文明走向的新事物苗头，都必然在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尽管前者因社会惯性的强大和面临末日的疯狂而往往压倒后者，但后者毕竟是代表了中国社会前进趋势的新生事物，必定会顽强地成长壮大，直至最后取代前者。

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以上所述思想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以及中华文化等诸因素，加之躁动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都是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要因素，其存在使文革在中国的发生带有某种必然性，但还不足以构成文革在中国必然发生的充分条件（或称因素），尚缺少必要的一环将上述所有因素连接成完整的充分必要条件（因素）圈。由于文革既不同于任何以下犯上的革命，也不同于任何从上到下的改革，而是在拥有绝对权威的最高领袖支持与号召下，下层民众冲击各级社会管理层的社会运动，这必要一环显然是需要一个非凡的领袖。

显然，这个领袖必定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坚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最公平合理、最优越的经济模式，坚信共产党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经之途，深信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当权者应该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者；这个领袖当然也必定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润，对现代“天理、天命”（真理，世界发展规律）具有非同寻常的执着。

这个非凡的领袖，还必须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和信仰，而且也得到他的同僚及下属敬若神明般的拥戴（即便利益受到损害，也不会想到或不敢反抗他们的领袖）。而且这一位被人崇拜的专制领袖还有绝对与众不同的一点，那就是，尽管近现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层级式的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统治的，这位专制领袖却不惧怕冲击甚至破坏自己借以实行统治的权力层级基础，而敢于从下至上地整治官员群体。而中国恰恰出了这样一个“上千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

正如上文所述，中共的执政实践必定与被视为真理的理论预期产生巨大的反差，坚信马记真理并深受中华文化浸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怀疑真理的真伪，而是把眼光聚焦在实践真理的人身上，认为必定是真理的实践者出了问题。

首先进入毛泽东法眼的，显然就是官民关系。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总体来说，虽然绝对程度比以往有所缓和，但相对于当局自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所产生的预期而言，民众的不满却更强烈。

针对建政后中共官员脱离群众的问题，中共领导层自然会作出符合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选择。那就是设法改造当权者，使他们自省自律，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他们思想革命化。但由于轻“物”，并没有对权力运作的工具（程序、规则、制度等）下功夫，并没有通过必要且必须的“物”来改变人，训练人。先是依赖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解

决问题，又扩展到开门整风。由于对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估计不足，党外的尖锐批评反而激起党内一片“狼来了”的反应，把个开门整风扭转成“反右派”运动，把集权专制的螺丝拧得更紧。然而却丝毫无助于避免官僚主义与解决官民矛盾，相反，每次大小运动之后官僚主义都变本加厉更加严重，官民矛盾更加尖锐。大概符合反弹定律，批评整治得越厉害，事后反弹就越凶。直至最终搞出不顾民众死活的“政绩工程”，造成千百万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惨剧。

这些，终于让作为共产党人中异数的毛泽东省悟到，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使官员与人民都树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以解决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反而更容易发生官僚主义的悖论。毛泽东不顾自己统治基础的党和国家层级结构可能受到损害，决意通过由下及上的“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来整治脱离群众的各级官员。至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历史的偶然性，终于结合以上各节所述的诸项必要因素以及背景因素，而构成了在中国导致文革的全部充分必要的条件。

以上各节所述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背景等诸因素的合力作用，恰恰得到了痴迷于平等之价值、执着于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又魄力超人之毛泽东的呼应，文革也就必然会在中国发生了，万事俱备，只欠一导火索了。

八，毛泽东的文革猜想与中国必须的文化革命

既然文革主流表现为一个即将终结的时代企图继续延续的尝试，文革就注定要失败。文革的失败不在于以军事政变的形式结束了文革，而在于文革无力建立新型的官民关系，在于文革试图通过整治人们的思想意识来约束权力、解决官民矛盾。

上面第五节中对中华文化导致文革必然性的讨论中指出，中华文化中的重人轻物和追求天理或真理的特点，直接表现为崇拜领袖以至个人迷信和执着信服“真理”的特点。在政治上导致呼唤专制领袖而轻忽社会管理工具理性的倾向，在文化上则导致崇拜、迷信能人的蒙昧和执着于“天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基本教义的蒙昧主义。显然，中华文化因其专制基因导致的这些缺陷，是长期以来阻止中国社会进入以民主、法治与人权为特征的现代先进文明的终极原因。所以，中国社会若要步入人类当今的先进文明，中华文化的专制基因必须经过文化改革（或文化革命）加以改造。

毛泽东似乎猜测到了中国需要文化革命，然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设想仍然因循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传统，仍然着眼于人的修炼，而没有借重于各种权力运作与监督的工具以保障权力运作的过程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一目标在于人的、特别是当权的人的文化革命，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异化为政治革命，而其建立的新型“三结合”政权徒有形式之新而不会有任何实质之新。因此，完全达不到本来应有的改革文化的目的。

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于干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否称“派”的分歧，亦即刘采取类似斯大林的态度，否定脱离民众的当权者与民众的矛盾属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却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置严厉、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也是也是斯大林那一套）；毛则执意要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意指“走资”并非个别个人之事，而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起来则从宽。相比之下，毛似乎注意到了人的因素之外的因素，因此个人的错责相对就轻了。

再者，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尊法批儒，及其一以贯之的崇法情节，而且法家确实是中国古代百家思想中最接近工具理性的思想，那么，在毛泽东提出文化革命的时候，他的内

心深处是否也意识到重人轻物的中华文化需要革命性的改变，移植接受西欧重物的文化基因呢？果如此，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虽然由于因循中华文化的重人轻物传统与政治化而失败了，但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文革归结为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革命性转变的猜测。而这是从中国最高当局到底层百姓都应该把毛的猜测变为行动，改革我们的文化，对中华文化进行崇尚工具理性与重“物”的转基因工程。

这里说的改革我们的文化，应是不折不扣地改革文化，绝不要有丝毫的政治化。一是继续并完成文革至今的第二次启蒙，破除任何领袖或能人迷信，破除对冒充真理的理论信仰；二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培养树立崇尚工具理性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提倡“从我做起”，坚持不懈。具体地讲，至少有以下诸点可以实施：

（1）改换单纯依靠思想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等着眼于人之修养的思路，强化权力运作程序、法规、制度等的建设完善，及其严格执行与监督。

（2）社会权力机构的运作程序、规章制度应予公开并严格遵照执行，各级当权干部及权力机构组织都应力争成为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秉持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的社会表率。

（3）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如工厂企业、学校、医院、街道社区、政府机构等，都应以公民组织要求、建设之，都应尽到公民组织对社会的义务和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本组织成员进行公民教育，特别是结合本组织运作的各种法规、制度及程序培养组织成员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

（4）教育要从孩子开始，在中小学开展公民教育，特别注意从小培养学生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

（5）鼓励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秉持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的各种社会行为，反之则应受到批评，形成社会舆论。

如果从现在做起，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概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无须经过革命，中国专制传统的文化基因就会被转变，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也就会瓜熟蒂落，和平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中国社会就可以步入世界先进文明了。

◇ 结束语

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但中国社会对文革的反思仍然远远不够。仍然为那个还乡团式的文革结论（或称“历史决议”）所羁绊，把文革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认为文革只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错误决策而发生的偶然性灾难。正是由于这个还乡团式文革结论的羁绊，国人没能从代价巨大的文革浩劫之后获得应有的收获，造成在中国发生文革的种种因素仍然存在，有些甚至还更加恶化了。

本文的分析表明，文革在中国的发生有其因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所造成的必然性，也有其时代和国际环境的印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尽管是导致中国发生文革的极其重要的必要因素，仍然只不过是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偶然因素。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X”泽东来弥补这一偶然的必要因素。而且就连毛泽东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的产物。

在上述导致中国必然发生文革的诸般必要因素中，中华文化中重人轻物与执着于“真理”的特点显然扮演着最关键的作用。其他各种因素诸如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等，在其他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都存在，但是没有一个发生了中国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盖缘于这些因素只有在上述中华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才会发展至导致文革的程度。而且，

整合上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诸必要因素而构成文革发生之必要充分条件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毛泽东领导的文革之所以失败，固然与混淆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目标有关，更加根本的原因则是毛泽东的文革依然是因循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传统。不但可能对中华文化实行必要的改革而达到文化革命原本应有的目标，而且由于未能基于工具理性构建社会及其权力机构并以工具理性和程序正义训练新人，而依然仅从权力机构的人员组成以及当权者的思想修为着手构建“三结合”的新式政权，其结果必然是“新”政权徒新其名而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断语可谓正确），以至由文化革命“异化”成的政治革命也必然归于失败。

其实，上述文化因素也是致使中国至今未能完成启蒙运动，而仍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所累的原因，也是中国无法实现民主法治与尊重人权的先进政治体制之根本原因，更是中国社会的官民矛盾自1949年以来无从根本解决的主要原因。所以，改造中华文化中重人轻物与执着于“真理”的特点，而吸收相应的西方有益文化，一来必可从根本上断绝发生文革的可能，二来将可为实现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先进社会铸就文化基础，使中国社会早日步入人类先进文明。

因此，当下中国，既事半功倍又一举二得者，即是改革中华文化的传统专制基因，从小处着手，从社会的每一个基本元素做起。滴水石穿，经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社会必会赶上世界先进文明。

定稿于 05 / 22 / 2017

〔作者简介：沈昆，男，1946年生。1965年入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1970年毕业。先后在大庆油田公路工程处、哈尔滨电机厂运输车间、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及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单位工作。1987年以访问学者身份留美，后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并定居。〕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